

哲学文库

上帝死了，神学何为？

20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



张旭 著

哲 学 文 库

上帝死了，神学何为？

20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

张旭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帝死了, 神学何为?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张旭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哲学文库)
ISBN 978-7-300-11887-1

- I. ①上…
- II. ①张…
- III. ①基督教-神学-研究
-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891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成果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哲学文库

上帝死了, 神学何为?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

张旭著

Shangdi Sile Shenxue Hewe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插页 3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6 000	定 价	47.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

本书的标题“上帝死了，神学何为？”的问题意识直接来自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在我求学之年，朋霍费尔和克尔凯郭尔（1813—1855）是吸引我进入基督教神学的两个人。后来我从比较心性的神学转向研究巴特更为博大精深的神学，其动机也可以归结于“上帝死了，神学何为？”这一基本的问题意识。

在我踏入学术研究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甚为时髦。整个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和现代性批判都肇始于尼采（1844—1900）。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从尼采对“我们时代的危机”即西方现代性整体危机的猛烈攻击和深刻反思而来。尼采开启后现代的那个著名的断言就是“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这句格言深刻地表达了尼采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衰落以及欧洲虚无主义时代来临的体验，它将西方的历史划开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现代和后现代。无疑，对基督教来说，尼采的话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断言，它也同样划开了基督教的现代与后现代。基督教的后现代不仅是对现代基督教的批判，而且更是一个“后基督教时代”。任何一个“理智上诚实”的神学家都无法回避基督教这一艰难的时代处境。

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可以说是 20 世纪第一个完全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回应尼采问题的神学家，因此，汉斯·昆有

理由将巴特称为“第一个后现代的神学家”。^① 而特洛尔奇仍属于被尼采的“上帝之死”的断言所分开的那个“现代”，他仍然被历史主义带来的现代虚无主义深深困扰，找不到任何出路。在巴特之后，朋霍费尔是 20 世纪第一个真诚地面对世俗世界回应尼采的挑战的伟大神学家，他在《狱中书简》中第一个坦陈“上帝之死的时代”的来临，并积极探索一种“非宗教的基督教”的可能性。巴特和朋霍费尔对尼采的挑战的回应将贯彻在本书对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的探索之中。我试图表明巴特、布尔特曼、朋霍费尔和莫尔特曼这些伟大的神学家是如何面对“上帝之死时代”的基督教危机，如何在我们时代的危机中重建基督教神学的。这一问题意识是我切入当代德国新教神学的视角。

尼采以“上帝之死”对欧洲虚无主义时代来临的深刻预判和对欧洲基督教毫不妥协的抨击震撼了他的时代。他以“积极虚无主义”摧毁基督教文明的努力，为重新理解和建构西方文明打开了新的视域，比如以雅典和罗马对抗耶路撒冷，以古典对抗现代。研究基督教神学和思考基督教如何能绕过尼采这个斯芬克斯之妖，就好像他所断言的“上帝之死”这一划时代的精神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就好像基督教及其神学从未从根基处被它冲击撼动？！“基督教与现代性”与“基督教与文化”的不言而喻的神学现代性的进路，难道能逃过尼采的断言猛烈的冲击和严厉的质疑吗？！如果基督教要保存和发展自身，对西方现代性在整体上保持批判而非调和的姿态，对它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吗？与尼采精神相通的克尔凯郭尔、欧韦贝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特有深刻的影响，他们深深触动了巴特去直面基督教生死攸关的基本问题。巴特的辩证神学革命与整个现代神学决裂，同时也意味着与神学自由主义以及新教文化主义全面决裂。因此，那些急于为当今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

^① 汉斯·昆在《基督教大思想家》中将巴特称为“神学后现代范式的发物者”，参见 Hans Küng, “Karl Barth: Theologie im Übergang zur Postmoderne”, *Große christliche Denker*, München, Piper, 1994, S223-257. 关于巴特与后现代神学，参见 William Stacy Johnson. *The Mystery of God: Karl Barth and the Post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olog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7; Geoff Thompson & Christian Mostert ed., *Karl Barth: A Future for Postmodern Theology?*, Adelaide, Australian Theological Forum, 2000; Steven Smith, *The Argument to the Other: Reason Beyond Reason in the Thought of Karl Barth and Emmanuel Levinas*. Chicago, Scholars, 1983.

“基督教与现代性”、为“基督教文化”寻求基督教神学的辩护资源和论证依据的人，首先要认真领教巴特、朋霍费尔和莫尔特曼这些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对自由神学和神学现代性所做的严厉批判。

本书的问题意识从尼采的断言及其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而来，我将巴特的“辩证神学”、朋霍费尔的“上帝之死神学”和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理解为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尼采关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断言的回应。只有进入这一尖锐的问题域中，我才能剔除那些基督教神学枝枝蔓蔓的学术细节和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立场，返回到 20 世纪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基本问题本身。

二

正是基于从尼采而来的问题意识，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巴特与特洛尔奇之间”的两难选择。当年巴特本人在一战前就对特洛尔奇那一套自由神学的东西看得非常透彻：特洛尔奇嘴上不说心里恐怕早已默认，基督教已死了。所谓“基督教文化”、“宗教史”或“科学的神学”，不过是基督教死去后留下的一个躯壳而已。特洛尔奇的历史主义的路子对于基督教来说是死路一条。如果不能克服主宰现代意识的历史主义，不管“基督教与现代性”还是“基督教与文化”，都不能走出“上帝之死”的基督教历史困境。巴特在神学和神学政治上抵制了特洛尔奇的现代性立场和自由主义取向，以彻底“反历史主义”的末世论精神重返“圣经的上帝”，重建作为“教会教义学”的基督教神学，领导了抵抗纳粹的认信耶稣基督作为独一之上帝之道的“认信教会”。巴特的“路德式的神学革命”彻底更新了基督教教会和神学对自身的自我理解，扭转了基督教神学现代性的基本方向，可以说，为整个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重新奠基。

大神学家托伦斯（Thomas Forsyth Torrance, 1913—2007）曾说：“巴特无疑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他不仅可以比肩于宗教改革时代的新教巨人路德和加尔文，而且也可比肩于古代教会的巨人阿塔那修和奥古斯丁。教皇保罗六世曾说，巴特是自 13 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位列在邓·司各特之上。尽管巴特也很欣赏罗马天主教神学，但是他对天主教教义的批判性分析极为尖锐而深刻。

因此，罗马教宗保罗六世对巴特的赞美就更令人惊奇。但是对巴特来说这不足为怪，因为他这个人远比四百年的新教对罗马天主教教会产生的影响还要巨大。”^①可以说，巴特不仅是新教的神学教父，也是整个 20 世纪基督教的神学教父。

在我的《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中有几段话，我认为仍有必要摘录于此：“巴特将毕生的精力放在信仰的内容之上，也就是《圣经》所见证的福音信息之上。展示基督教独一无二的特质，谦卑地聆听《圣经》所见证的特殊的上帝之道，自由而满怀感激地叙述和见证上帝在耶稣基督之中唯一的自我启示，这就是巴特神学的使命。因此，他既没有像布尔特曼及其整个学派那样，运用现代人可以理解的现代语言即无神论的生存哲学，用《圣经》的福音信息消解其神话化的世界观，以使其更适应对现代人布道的需要；他也没有像朋霍费尔那样，面对自律的时代和成年了的世界，进行‘非宗教的基督教’的事业；他既没有像蒂利希那样，在人的生存与作为终极关怀的深度存在本身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建立一套系统神学；他也没有像莫尔特曼和潘能伯格那样，把政治解放或世界历史作为基督教福音的基本境域。在巴特看来，这些 20 世纪的神学潮流无非是一些形式翻新的新哲学人类学，它们无一不是现代自由主义神学的嗣子。巴特不仅对 19 世纪的现代新教神学如施莱尔马赫的神学，以及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神学如哈纳克、特洛尔奇、赫尔曼的神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也批判了布尔特曼、朋霍费尔、蒂利希、莫尔特曼等这些 20 世纪神学革命领导者的新自由主义神学。巴特对宗教改革之后到 20 世纪下半叶的整个现代神学的彻底批判，终结了‘神学的现代性’，开启了‘神学的后现代’。可以说，体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上帝之死’既是整个‘神学现代性’的结果，也是反思这一神学现代性的后现代神学的开端。当然，这种神学后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本质的彻底完成和更为激进的推进，而是在重返基督教的古代性的基础、重返对上帝的恩典奇迹的信仰之上的重建。”^②

“巴特以教会教义学这一地地道道的神学形式，不夹杂任何哲学、文

^① Thomas F. Torrance, *Karl Barth: Biblical and Evangelical Theologia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0. p. 1.

^②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41~4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化理论、宗教哲学的东西，真正打通了重返《圣经》以及整个基督教的伟大传统之路，为基督教教会和神学确立了本己的生死存亡的根基。巴特的教会教义学的神学样式最适宜他展示和见证基督教基本福音信息的主题和使命，通过原原本本地忠实理解和阐明《圣经》所见证的上帝之道，他为20世纪基督教神学完成了重新奠基的工作，不仅为基督教教会和基督徒个人，也为所有非基督徒，甚至是非西方人重新深入理解基督教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巴特的基本理由。为什么我们不是泛泛地进行基督教研究而要进行纯粹的神学研究呢？为什么我们的神学研究不采取特洛尔奇、布尔特曼、蒂利希、潘能伯格、特雷西、希克等等的那些现代人文知识学的范式，或学院神学的研究范式呢？为什么我们不从历史主义、文化理论、政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解释学、思想史等现代知识学的视角去研究基督教，而是试图直接回到对基督教思想最核心的基督教神学，以及对《圣经》最地道道的理解与解释呢？这首先与我们的研究意图有关，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去理解真正的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最核心的要素的最本己、最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做这个巴特神学研究的初衷。巴特的上帝之道神学是完全基于信仰《圣经》的实在性的‘神学本体论’或‘上帝中心主义’的神学。巴特在20世纪神学中的地位相当于海德格尔在哲学中的地位。对于巴特来说，《圣经》所见证的、教会所宣讲的和基督徒所信仰的基督教的事情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上帝之道，除此之外，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教会都没有别的根基。巴特的教会教义学神学是一个伟大的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最核心的要素即基督教及其思想最本己、最深刻的理解和解释。”^①

“巴特从他发表《〈罗马书〉释义》起，就一直处于争论和批判的漩涡之中。他的弟弟海因利希和朋友绍茨从哲学的立场批判他，他的辩证神学的伙伴布尔特曼在解释学问题上批判他，布龙纳在普遍启示问题上批判他，戈嘉滕在生存辩证法和世俗化的问题上批判他的新形而上学，蒂利希批判他的神学霸道不讲理，哈纳克、施拉特、于利歇、韦恩勒等老一代神学权威批判他是蔑视科学神学和历史批判法的现代圣灵主义和圣经主义，拉加茨批判他的危机神学的傲慢，美国的新正统主义者尼布

^①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70页。

尔批判他对教会之外毫无影响力，朋霍费尔批判他的启示实证主义，潘能伯格批判他的启示主体性和神格唯一论，阿尔特豪斯批判他的基督绝对论，提利克批判他的和解论有结构化的危险，艾莱尔特批判他背叛了路德对律法的解释，普茨瓦拉批判他的新正统主义不过是宗教改革的复兴运动，新自由主义神学家批判他的正统主义立场，还有人批判他的伦理学不切实际……这些对巴特的批判或许都不无道理，但是，却没有一个批判能真正撼动巴特的历史地位。20世纪最有影响的几位新教神学大家，如布尔特曼、朋霍费尔、莫尔特曼、潘能伯格、云格尔、奥特，以及天主教神学大家巴尔塔萨、汉斯·昆等，有谁不曾深深地受益于巴特呢。巴特作为一个‘开端’性人物，其意义不仅在于‘终结’一个时代的基督教神学言说与教会实践，而且也在于开出了基督教神学聆听上帝之道、言说上帝以及认信上帝之道的新空间与新道路，在于为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提出了最紧迫和最本质的问题，将基督教神学和教会重新建立在正道之上。就此而言，巴特为20世纪基督教神学打开了新开端，奠定了新基础，规定了新方向，他无愧于‘20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①上述观点可以解释我当初选择巴特而非特洛尔奇作为我的神学研究方向的理由，也代表我对巴特神学的基本认识。

在“后基督教时代”，若没有巴特在上帝自我启示于耶稣基督的基础之上重新阐发基督教基本福音信息和教会教义传统的艰苦努力，就没有今日基督教教会和神学生存的真正的根基。正是巴特神学的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才使得基督教能够抵挡各种神学现代性的诱惑和压力，立身于自我认知、自我理解、自我确证和自我表达之上。各种人文主义、社会理论、历史哲学、解释学、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对基督教的解释，对于基督教而言，往往缺乏对基督教的时代处境的自我意识，对上帝之死时代中基督教的衰微漠不关心，对于基督教自身所面临的危机听之任之，缺乏基督教通过其神学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表达的紧迫诉求。而基督教神学本身如果也随波逐流，求助于五花八门的现代哲学话语建构自身的知识（比如，求助于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诉诸本己的信仰，或者求助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诉诸救赎史；求助于康德式的先验宗教情感诉诸各种宗教

^①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24～25页。

经验，或者求助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化理论诉诸基督教的文化与价值……），就等于主动放弃探寻基督教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基础。这种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努力显然未能深刻认识到神学与哲学根本是相互冲突的，而且它也未能见到 20 世纪神学与哲学日渐分离的历史大势。只有重新返回和重新阐释基督教自身的根基，即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圣经》和教会，只有站立在基督教自身博大精深的思想传统、社会传统和文化传统之中，基督教才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之中拼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立身于基督教自身的根基之上，为基督教会和神学重新奠基，这就是巴特神学的使命。也正因如此，巴特神学乃是整个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无可争议的核心。

三

巴特神学不仅是与现代神学彻底决裂的 20 世纪神学的奠基和开端，而且也是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核心。在与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神学的现代神学的决裂时刻，巴特终结了哈纳克、特洛尔奇和赫尔曼的自由神学及其历史批判法。在 20 世纪神学的开端时刻，巴特与布尔特曼、布龙纳、戈嘉滕一道发动了辩证神学革命；为了彻底捍卫这一立场，他又与这些革命同道激烈论战，抵制他们滑向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类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立场的倾向，捍卫基督教神学的上帝之道的的基础。在 20 世纪神学的中心点上，巴特不仅通过数量庞大的“巴特派”（如伊万德（Hans Joachim Iwand, 1899—1960）、迪姆（Hermann Diem, 1900—1975）、沃尔夫（Ernst Wolf, 1902—1971）、韦伯（Otto Weber, 1902—1971）、沃格尔（Heinrich Vogel, 1902—1989）、戈尔维策（Helmut Gollwotzer, 1908—1993）、克雷克（Walter Kreck, 1908—2002）、斯特克（Karl Gerhard Steck, 1908—1983）、奥特（Heinrich Ott, 1929—）、云格尔（Eberhard Jüngel, 1933—）等）对德国神学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也通过那些深受其影响的英美神学家（如托伦斯（Thomas Forsyth Torrance, 1913—2007）、弗莱（Hans Wilhelm Frei, 1922—1988）等）以及天主教神学家（如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汉斯·昆（Hans Küng, 1928—）等）对 20 世纪神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些大神学家（如

布尔特曼、朋霍费尔、提利克、莫尔特曼、潘能伯格等）也总是将他作为批判的参照系。20 世纪基督教神学，谁也不可能绕过巴特，正如朋霍费尔所说，人们只能在巴特神学革命的新起点上开始 20 世纪神学。

朋霍费尔神学和莫尔特曼神学是在巴特神学的起点和基础之上发展出的两种神学，在本书中我将它们视为巴特神学充分的和必要的推进、扩展和补充。我将整个 20 世纪德国新教神学的主流定位于“巴特—朋霍费尔—莫尔特曼”这条一脉相承的思想发展线索，与之竞争的是布尔特曼的生存神学和潘能伯格的历史神学等。当然，正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哲学运动无法容纳整个 20 世纪德国哲学一样，“巴特—朋霍费尔—莫尔特曼”这一神学运动也无法容纳整个 20 世纪德国神学，但是，这条脉络对于把握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主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先性。本书无意于全面评述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史，而是试图在德国新教神学的“巴特—朋霍费尔—莫尔特曼”这个框架之中来描述和理解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回到事物本身”固然需要一个思想史的铺垫，但更根本的还是直面基本问题本身。

四

从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脉络来看，本书所采用的“巴特—布尔特曼—朋霍费尔—莫尔特曼”的线索，代表了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四场革命性思想运动。^① 20 世纪第一场神学革命乃是巴特针对 18、19

^① 关于 20 世纪神学史，参见 Heinz Zahrnt, *Die Sache mit Gott: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R. Piper, 1966; Heinrich Fries & Georg Kretschmar, Hg., *Klassiker der Theologie*. I: *Von Irenäus bis Martin Luthé*; II: *Von Richard Simon bis Dietrich Bonhoeffer*. München, C. H. Beck, 1981, 1983; Rosino Gibellini, *Handbuch der Theologie im 20. Jahrhundert*, Regensburg, Friedrich Pustet, 1995; Hermann Fischer,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20. Jahrhundert*, Stuttgart, Kohlhammer, 2002; Hendrikus Berkhof, *Two Hundred Years of Theology: Report of a Personal Journey*, trans. John Vrie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9; David Ford, ed., *The Modern Theologians,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Gerhard Sauter, "Th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Vol 5, Erwin Fahlbusch et al., e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p. 374-404.

世纪现代神学，尤其是一战前的德国自由神学所发动的颠覆性的革命。按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短暂的世纪”的讲法，20世纪实际上开始于一战。在一战之前，基督教神学仍然是19世纪的“自由神学”（die liberale Theologie）的天下，辩证神学家们的老师大都是自由神学家。利奇尔学派创始人利奇尔（Albert Ritschl, 1822—1889）及其学派（如海林（Theodor Haering）、卡夫坦（Julius Kaftan）、于利歇（Adolf Julicher）、魏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8）、泽贝格（Reinhold Seeberg）、海特缪勒（Wilhelm Heitmüller）、施拉特（Aldof Schlatter）等），以及自由神学最著名的三位神学家，即柏林的教义史大师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马堡的赫尔曼（Wilhelm Herrmann, 1846—1922）和海德堡的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主宰了当时神学界。早期利奇尔派的自由神学与当时的黑格尔主义的思辨神学以及爱尔兰根学派的施莱尔马赫主义相抗衡，它既批判黑格尔学派形而上学的上帝观，也批判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虔诚的宗教意识”和“绝对依赖感”的主观性“宗教体验观”，并以康德的道德自由感取而代之。尽管如此，它倡导宗教与历史、道德、文化相结合的路数，仍属于“19世纪神学教父”施莱尔马赫所开创的现代神学范式，即恪守宗教生活相对于科学和道德的自立性，坚持基督位格在整个基督教中的绝对中心地位，坚持以历史的宗教克服宗教唯心主义。^①而自由神学晚期的宗教史学派（如特洛尔奇、布塞特（Wilhelm Bousett）、龚克尔（Herrmann Gunkel）、艾希霍恩（Albert Eichhorn）、弗雷德（William Wrede）、拉尔夫斯（Alfred Ralphs）、魏斯（Johannes Weiss）等）通过原始基督教的末世论的发现，已经突破了利奇尔的自由神学，但是，由于它仍然受制于历史主义和新教文化主义，因此，未能在根本上突破自由神学的立场。

^① 巴特对施莱尔马赫的评论，参见 Karl Barth, *Evangel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Zürich, Theologischer, 1957, Protestant Th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CM Press, 1973. pp. 425-473; *Die Theologie Schleiermachers, 1923/1924, Gesamtausgabe II.* hg., Dietrich Ritschl, Zürich, Theologischer, 1978;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1.

自由神学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突然死亡，它死于自己的巅峰时刻。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由神学一代宗师哈纳克为德国皇帝起草号召全国人民书，并率 93 名德国学界权威人物发表“知识界声明”支持德国参战。在那个时刻巴特猛然意识到，自由神学之所以一夜之间沦为“战争神学”，完全是由于自由神学的基本精神出了问题，因此，它的伦理学、教义学、圣经解释和历史批判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① 巴特与自由神学的决裂开启了 20 世纪神学。一战刚刚结束，巴特以其《〈罗马书〉释义》掀起了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第一场革命运动，即“辩证神学”运动。^② 巴特吸引了图尼森（Eduard Thurneysen, 1888—1974）、布龙纳（Emil Brunner, 1889—1966）、戈嘉滕（Friedrich Gogarten, 1887—1967）、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和梅茨（Georg Merz, 1892—1959）等人围绕他们的喉舌杂志《时代之间》（*Zwischen den Zeiten*），结成了辩证神学阵营。

辩证神学以与人的历史迥然相异的“上帝之道”批判现代神学的历史主义路线和方案，其主题回到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正统的基本主题，即“上帝之道”之上。因此，辩证神学又被称为“新正统主义”或“上帝之道神学”。而尼布尔兄弟（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H. Richard Niebuhr, 1894—1962）在美国也掀起一场“新正统主义”运动，它在抵制 19 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方面与辩证神学有诸多相近之处。一战后德国青年辩证神学运动与其他神学家（如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等）以及由霍尔（Karl Holl, 1866—1926）和赫尔曼（Rudolf Herrmann, 1887—1962）领导的“路德复兴运动”的青年神学家们（如希尔施（Emanuel Hirsch, 1888—1972）、阿尔特豪斯（Paul Althaus, 1888—1966）、艾莱尔特（Werner Elert, 1885—1954）等）一道，迅速夺取了一战前老一代神学家哈纳克、特洛

^① Karl Barth, *Evangel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1957, S6; “Nachwort”, *Schleiermacher-Auswahl*, Hg., Heinz Bolli, München, Siebenstern Taschenbuch, 1968, S290—232, 此处, S293.

^② 准确地说，《〈罗马书〉释义》（第一版，1919）的神学可以称之为“危机神学”（*Theologie der Krise*），而《〈罗马书〉释义》（第二版，1921）的神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辩证神学（*Dialektische Theologie*）”。

尔奇和于利歇的权威地位，终结了自由神学的统治。^①而德国辩证神学运动的影响也迅速波及整个欧洲。

辩证神学运动直至 1933 年纳粹上台前后，因巴特与其他辩证神学家对纳粹的政治立场分歧而解体。巴特批判戈嘉滕以及路德复兴运动的神学家阿尔特豪斯、艾莱尔特、希尔施等人的“民族神学”主张，并与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阿斯姆森（Hans Asmussen）、布莱特（Thomas Breit）、萨瑟（Hermann Sasse）等一起成立了抵抗支持纳粹政权的德国福音教会（DEK）的“认信教会”（Die Bekennende Kirche）。认信教会的巴门主教会议在 1934 年 5 月 31 日发表了巴特撰写的《巴门神学宣言》（*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它被尊为“20 世纪基督教信经”。它以认信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独一一体的启示，坚决抵制“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所谓的民族教会及其民族神学。领导认信教会抵抗纳粹，可以说是巴特的辩证神学革命的神学一政治实践的面向。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第二场运动是从辩证神学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以布尔特曼的生存神学为代表的“神学人类学转折”。辩证神学家戈嘉滕、布尔特曼、蒂利希和布龙纳等都深受克尔凯郭尔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他们不仅强调上帝之道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根本任务，而且更强调“上帝之道”在人的信仰生存中与人的相遇，因此，他们要求在辩证神学的“上帝之道”的转折之后，再进一步实行“人类学转折”。除了布尔特曼的存在主义神学及其“解神话化”（die Entmythologisierung）纲领之外，戈嘉滕的“世俗化神学”（Theologie der Säkularisierung）、蒂利希的存在主义神学和“文化神学”（Theologie der Kultur）以及天主教巨擘拉纳（Karl Rahner, 1904—1984）的“先验神学”，都是这场神学人类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① 关于“路德复兴运动”，参见 Heinrich Assel, *Der andere Aufbruch: Die Lutherrenaissance Ursprünge, Aporien und Wege*; Karl Holl, Emanuel Hirsch, Rudolf Hermann (1910—193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4。“路德复兴运动”的主将后来令人痛心支持纳粹的日耳曼民族教会，成为教会斗争中巴特的敌人，参见 Robert Ericksen, *Theologians Under Hitler*; Gerhard Kittel, Paul Althaus, and Eminent Hirsc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参见 Karl Rahner, “The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VIII, Zürich-Einsiedeln-Köln, Benziger 1968. S43—65。

巴特本人坚决抵制这一神学人类学转折，认为它不过是重蹈现代神学基本路线的覆辙。而布尔特曼则认为非有这一转折，否则不能解决上帝之道如何被信仰和认识的解释学问题。从布尔特曼的生存神学和解释学思想出发，布尔特曼的弟子富克斯（Ernst Fuchs，1903—1983）和艾伯林（Gerhard Ebeling，1912—2001）发展出一套“解释学神学”，天主教神学家毕塞尔（Eugen Biser）和特雷西（David Tracy）都是解释学神学路线的有力支持者。富克斯和艾伯林的解释学神学从右翼推进了布尔特曼神学，而布尔特曼的另一些弟子（如凯泽曼（Ernst Käsemann）、波恩卡姆（Günter Bornkamm）、富克斯、艾伯林、孔策曼（Hans Conzelmann）、罗宾逊（J. M. Robison）等）则从左翼推进了布尔特曼神学。他们与他们的老师布尔特曼就“历史的耶稣”还是“宣道的基督”的问题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论争长达十余年。这场神学大论战推进了“历史的耶稣”新的探究，基督的此世性和世俗性以及历史性和政治性又重新回到基督教神学的中心，对重建基督教神学的基督论和教会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布尔特曼的生存神学、解神话化纲领和宣道末世论，以及由他激发的解释学神学和“历史的耶稣”新探，对天主教神学家（如施勒贝克斯、凯塞曼和卡斯培等）的影响也很大，并进一步扩大到英美世界。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第三场革命运动诞生于纳粹集中营中受难的神学家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的“非宗教的基督教”（nichtreligiöses Christentum）思想，他的遗著在二战后出版，在五六十年代激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基督教世俗化神学运动。以朋霍费尔的“上帝之死神学”为核心，加上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戈嘉滕的“世俗化神学”和蒂利希的“文化神学”以及怀特海和小科布（John Cobb, Jr.）的“过程神学”的推动，由许多英美神学家（如阿尔泰泽、瓦哈尼安、范布伦、哈密尔顿、罗宾逊、考克斯以及犹太教的鲁本斯坦等）共同掀起了一场世俗化神学运动。这场神学运动明显带有 60 年代的时代烙印，它与基督教会，尤其是天主教方面的世俗化改革运动和普世运动（如 1962 年召开的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 年 10 月 11 日—1965 年 12 月 8 日）和 1966 年召开的日内瓦世界基督教联合会议）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借助于世俗化神学运动广泛深远的影响，

朋霍费尔的思想不仅超出了国籍和教派，而且也超出了基督教本身。这是其他神学家无法与朋霍费尔相比之处。

朋霍费尔的神学五六十年代在英美激发了世俗化神学运动，在德国则催生了 20 世纪 60 年代由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领导的“盼望神学”（Theologie der Hoffnung）运动和“新政治神学”（Neue Politische Theologie）运动，它逐渐取代了朋霍费尔的“上帝之死神学”，成为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第四场范式革命。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与稍早于他成名的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1928—）的“历史神学”，都深受拉德（Gerhard von Rad, 1901—1971）的旧约神学的应许史观的影响，他们将上帝的启示视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在历史境域中带给人以末世论的盼望。与潘能伯格相对保守的倾向不同，莫尔特曼的神学是一种左派神学，一种批判神学，一种革命神学。它与拉丁美洲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索布里诺（Jon Sobrino）和阿尔维斯（Rubem Alves）领导的“解放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科恩（James Cone）、华盛顿（Joseph Washington）和罗伯茨（Deotis Roberts）领导的黑人神学以及温德尔（Elisabeth Moltmann-Wendel）、卢特（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和拉塞尔（Letty Russell）倡导的女性主义神学，互相引以为同道。^①

莫尔特曼还与女神学家瑟勒（Dorothee Sölle, 1929—2003）和拉纳的弟子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 1928—）一起领导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新政治神学”运动。莫尔特曼的政治神学是其“盼望神学”的实践维度，而其末世论的基督论维度则体现于他 70 年代的“十字架神学”之中。莫尔特曼的“十字架神学”与云格尔（Eberhard Jüngel, 1934—）的“十字架神学”都是回应“奥斯维辛”和“上帝之死时代”基督教的危机与困境之作，是 70 年代基督教神学之精华所在。20 世纪 80 年代起世纪末，莫尔特曼建构了一套“弥赛亚神学体系”，其中以朝向上帝之国的社会三一论、基于犹太教的“安息”与“舍金纳”观念建构的生态创世论，以及将基督论重新纳入犹太应许史传统的“弥

^①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Erfahrungen theologischen Denkens: Wege und Formen christlicher Theologie*, Gütersloh, Chr. Kaiser/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9, S166-265.

赛亚基督论”这三大部分，为当代“生态神学”（ökologische Theologie）、“普世神学”（ökumenische Theologie）和“犹太—基督教对话”做出了重大贡献。巴特、布尔特曼、朋霍费尔和莫尔特曼这四位大神学家是 20 世纪四场轰轰烈烈的神学革命的领袖。可以说，到了莫尔特曼这里，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经典时代”就结束了。

从上面勾勒的这份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图景中可以看到，本书所论及的“巴特—布尔特曼—朋霍费尔—莫尔特曼”的思想脉络，对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基本问题有充分的解释能力。虽然这是一个以德国新教神学为中心论域的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简史，不过也有充分的理据回应“欧洲中心论”甚至是“德国中心论”的质疑。自雷马鲁斯（Herrmann Reimarus）、莱辛和塞姆勒（Johann Semler）以来，德国新教神学在《圣经》的历史批判研究、教会史研究、教义史研究、系统神学等方面一直占有垄断性的领先地位，天主教神学和英美神学的原创性从未达到德国新教神学的高度和深度。^① 这是个基本的史实。

至于为什么德国新教神学能几个世纪以来长期占据基督教神学的领先地位，首先恐怕是因为德国新教神学自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四百多年间，从正统神学（klassische Orthodoxie）和 18 世纪的虔敬派神学运动，到 19 世纪的施莱尔马赫神学、思辨神学和自由神学，再到 20 世纪巴特的辩证神学、布尔特曼的生存神学和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它一直是基督教神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传统。正如潘能伯格所显示的那样，四百多年间它始终与一个伟大的德国哲学传统相伴。可以说，莱辛、康德、赫尔德、诺瓦里斯、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布洛赫、伽达默尔对德国新教神学的影响，甚至比一般的神学家的影响还要大得多。^② 德国神学与德国哲学的共生关系使得德语神学具有其他教派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神学所不能比

① 参见 John Wilso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Theology: Trajectories in the German Tradi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7.

② 参见 Wolfhart Pannenberg,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Ihr Verhältnis im Lichte ihrer gemeinsam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在巴特的《19 世纪新教神学》和蒂利希的《基督教思想史》中都给了这些哲学家以大量的篇幅，参见 Karl Barth,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Zürich, Evangelischer Verlag, 1952; Paul Tilli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